

文澜讲坛

公益 · 亲民 · 开放

文澜听涛



WEN LAN TING TAO



——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集（三）

贾晓东 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澜听涛: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集.3/贾晓东主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0715-547-8

I. ①文… II. ①贾…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5015 号

文 澜 听 涛

——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集(三)

贾晓东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孙雪艳

封面设计 刘 欣

激光照排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92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547-8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贾晓东

执行主编 朱小燕

副 主 编 陈 瑛 方 洁 汪 亮

黄海晶

编 委 胡梅珍 王立平

序

陈 瑶

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的同志送来了讲座集《文澜听涛》第三辑的样稿，邀我为之写序。既是盛情难却，也是因为之前对“文澜讲坛”的了解，心有所动，觉得责无旁贷，故恭敬不如从命。

《文澜听涛》第三辑收集了“文澜讲坛”2008 年度的部分讲座文稿，可以说是精华之选。展读一过，确也生发出一些观感。

纵览讲座系列的选择和配置，将浙江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景观、将历史和现实、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有机和谐地糅合，足显主事者的匠心：

生在浙江、创业在浙江，对浙江的历史文化哪能一脸茫然，否则何以直面现实，何以继往开来——浙江历史文化系列讲座让你在了解乡土的同时认识自己，让你在回望历史中励志。

浙江、杭州素来是历代名人、名流心灵与山水共舞的平台，留痕之深，影响之广，颇令当代游人油然而生与古人同泛轻舟、共踩山径之幽思——“名人留影”系列为我们流连湖山添抹了一份浓浓的人文底色。

讲讲音乐与人生的体念，谈谈当代中国电影的现状，自然是我们闲暇之时欣赏的话题，但“家事、国事，事事关心”依然是我们无法挥去的一份守望，也懂得在各种社会热潮中始终护持静思的心境，所以，国际战略态势和中国外交布局的讲座不可或缺，文化与知识更要重新解读——讲座主办者良苦用心感人至深。

文学作品仅靠阅读是难以体味个中三昧的，文学欣赏讲座教给你如何透过文字的表象，直逼作家和作品的思想、理念或玄机，而最终的结果是：它将会让世界欣赏你高雅、深邃的文学品位。

中国社会渐入小康，柴米茶盐之类的开门七件大事早已式微，健康和维权的宏旨乃至细节，成了大众关注的新焦点，因此，“健商新论”及“市民学法”讲座充分体现了讲座主办者对听众需求的关注、对细节的关注，而事实上往往有“细节决定一切”的格局。

在国学热中，“文澜讲坛”似也未“免俗”，推出了“国学与儒学系列讲座”。担纲主讲的“浙江省儒学会”品牌坚挺，终使儒学讲座深入浅出、贴近人生、一气呵成、余音绕梁，而无丝毫戏说之虞。



浙江的先贤,也就是曾说过一句让后人很风光的话“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的明朝人王思任,平生历游各地名山大川,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游记。视野宽泛,自然胸有丘壑,其中有篇《淇园记》劈头就发大议论:“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巉目凹,蜀得其险;骨大肉张,秦得其壮;昂首须戟,楚得其雄;意清态远,吴得其媚;貌古格幻,闽得其奇;骨采衣妍,滇粤得其丽。然而韶秀冲停,和静娟好,则越得其佳。”真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人物创一方天地,展读《文澜听涛》第三辑,似乎从另一方面佐证了王思任的论点。我想,以“韶秀冲停,和静娟好”来评说这本讲座集,恐不为过吧。当然,这些看法是否确当,待证之于讲座的广大听众和讲座集的诸位读者了。

据我了解,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的工作人员仅数人,而且并非单纯搞讲座,他们还肩负着组织读书活动、主办全省性读书节、举办各类展览等重任。浙江图书馆又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讲座运作的经费有限,讲师在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准备材料举办一次讲座后,所得也只是象征性的些微报酬。讲座集出版后全部免费供读者阅读,讲师无分文稿酬。即便如此,本书收集的全部讲座文稿,均由各位讲师本人亲自修改、润色、定稿。据本书编辑介绍,著名音乐家卞祖善先生曾四次从北京或出差地打电话给编辑,就其讲座文稿提出个别词、句的修改意见。这一切,令我非常感动。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广大读者和听众对讲座的欢迎、支持和鼓励:每次讲座结束后,讲师都会被热情的听众团团围住,就讲座内容或进一步探讨或交流不同观点,或留下讲师电话以便随后继续请教;每次讲座结束后,听众都会在“讲座点评”表上留下热情洋溢的言辞,有支持,有鼓励,更有对讲座未来发展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有这样的讲师,有这样的听众,有这样的讲座工作人员,我为之感到自豪和欣慰。

2009年12月28日,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荣获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颁发的“全省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三贴近’优秀奖”,我坚信,“文澜讲坛”的兴旺、发展自不待言。

2010年2月28日

(作者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





目 录

回望与思考——名人留影

- ◎永恒的傅雷精神 傅 敏(3)
- ◎走近苏东坡 鲍志成(18)
- ◎吴越钱氏家训与钱学森钱永健成才之路 邹身城(33)
- ◎杭州女儿林徽因 金援潮(44)

孔夫子“儒”是说——国学与儒家系列

- ◎中华和谐文化新论——兼论多元和谐文化观 吴 光(53)
- ◎儒家伦理与人间佛教 李明友(63)
- ◎“四书”与儒家精神 何 俊(72)
- ◎“和而不同”与中国比较文学 王福和(82)
- ◎阳明学与东亚社会的近代化 钱 明(92)
- ◎儒家创始人的义利观 邵鸿烈(104)
- ◎佛教与儒学 颜洽茂(120)
- ◎被误读的《论语》——兼谈《论语》的经典地位问题 宫云维(134)
- ◎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 董根洪(143)

家门口的奥运——认知奥运

- ◎奥林匹克标志的现实价值 湛远知(155)

一个时尚而沉重的话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古戏遗韵赏析 吕建华(165)

热潮中的静思——文化与知识解读

- ◎全球化中的文化竞争与文化自觉 孙 雄(175)
- ◎关于知识价值的新解读 曹文彪(184)
- ◎汉字结构与书体演变 祝鸿杰(193)



透视世纪风云——国际问题

- ◎当前国际战略态势与中国外交布局 方柏华(205)

品味闲适——休闲文化

- ◎音乐与人生 卞祖善(217)
◎当代中国电影现状 丁莉丽(227)

健康也需高智商——健商新论

- ◎解读“健商”，维护健康 戴 迪(239)

心灵与山水共舞——浙江历史文化

- ◎浙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陈汉波(251)
◎秦汉以前的杭州 林华东(259)
◎诗人词客重湖山——浅谈西湖诗词文化 尚佐文(266)
◎情归西湖 李 钢(278)

经典重访——文学欣赏

-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暴君和野心家形象 洪忠煌(289)

殷殷赤子心——文学创作辅导

- ◎我的梦想——儿童剧创作感悟 阮东英(299)

知法者胜——市民学法

- ◎维护您的民事权利 吴清旺(309)
◎婚姻家庭财产法律问题 苏亚迪(319)



回望与思考——名人留影

永恒的傅雷精神

傅 敏

今天先讲一下我父亲的家史。从最新的研究来看,我们祖上有一个叫傅友德的人,他是明代开国功臣之一,是一位大将。他是从江西出来的,曾经在云南打过仗,后来到了南京。明太祖在南京建立明朝,掌权以后,把一批功臣都杀了。傅友德受奸臣的诬陷,知道会满门抄斩,就让自己的三个儿子纷纷出逃,最小的一个儿子逃到了浙江海盐一带,在海盐繁衍生息成傅氏大族。据记载,到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傅庆公为迁居南汇的始祖。传到第四代,也就是明嘉靖年间,傅端生有一子,叫傅日蕃,病逝于北上赶考途中,留下幼子傅彭年,由祖父傅端抚养。傅彭年周岁时体弱多病,祖父只有此独苗一根,生怕孙子命不长,所以整日抱着孙子长吁短叹,由于长期悲伤,不久去世。当时,本族有一无赖,想侵吞留下的殷厚家业,设计谋害傅家独苗傅彭年。一天夜晚,无赖持刀进入傅家。老家丁奚六事先得知此事,把自己的幼子替换下傅彭年,这样幼仆遇难,傅彭年免遭此难。之后,傅彭年成婚有了五个儿子,一直衍生至第十八代傅雷。我祖父后来遭土豪地痞陷害入监狱,得肺病,出狱不久就去世,才24岁。从家史来看,我们家有这么多次灾难!几次几乎夭折,夭折了就没有傅雷这个人,今天我也不可能坐在这里做什么讲座了!所以从傅家几代来看,一直到我父亲,确实不是一帆风顺。

我祖父生前在我祖母李欲赓捐资筹办的“杨洁学堂”教书,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4岁。我祖母是个不识字的人,但非常有头脑,非常有见识,在族里威望很高,族里发生了纠纷,往往请她来公断。我祖父去世后,她觉得原来住的下沙地区(属于现代的南汇航头镇边缘的一个村庄)比较闭塞,于是就举家搬迁至当时比较繁荣的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祖母很有眼光。祖母在父亲小时候就请老先生到家里教他读书、写字,父亲在周浦镇一直住到大约11岁。父亲小时候出奇地调皮,但也非常聪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没有一个调皮的孩子是笨蛋的!我父亲调皮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两个例子:老先生在家里教他写字,告诉他怎么写,他就练,老先生拿着书,踱过来踱过去;我父亲就在老先生从他身旁踱过去的时候在老先生背上画一笔,再踱过来的时候,又画一笔,最后画成一个乌龟,他自得其乐。祖母知道了就狠狠打了他一顿。还有一次,据说他玩火,差点把房子烧了,祖母简直没有办法了,将他五花大绑,要把他扔到河里去,然后自



杀。我父亲的惨叫声引来了房东,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我父亲的童年时代。

11岁以后父亲被送到上海念书,先在南洋中学附小,由于长期在我祖母的严管下,当时脱离了那个环境,就格外地调皮,拿我父亲自己的话来说是“顽劣”,后来被学校开除。于是进了徐汇公学,就是现在的徐汇中学。那是个天主教会学校。我父亲从小对宗教很反感,以前在浦东老家祭祖宗、做道场时,常常爬上去拿了贡品就吃,他不信那一套,说那都是假的。到了天主教学校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他根本不信什么上帝,认为那都是愚弄人,骗人的,所以念了三年,最后也被开除了。

后来他又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这时他进入了青年时期,开始成熟了。当年他的大同附中同学、翻译家周煦良教授,在“文化大革命”后对我讲:“你父亲当年在学校里是个风云人物,是学生领袖之一。五卅惨案时,带头上街,演讲,散发传单,抨击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大同校董吴稚晖就说傅雷是共产党,要抓他。你祖母着急了,硬把他弄回浦东老家。”等风平浪静以后,父亲又到上海的一所很普通的持志大学念书,不到一年就去法国留学了。

我父亲在去法国留学以前,已经写了不少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国家图书馆这次纪念展览(2008年傅雷百年诞辰展)4月7日开幕那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他是收集各种文史资料的专家),给我带来了四篇文章,有短篇小说也有散文,其中一篇叫《介绍一本使你下泪的书》。我父亲介绍的这本书可能大家都看过,就是《爱的教育》,是夏丏尊翻译的。还有一篇叫《关于狗的回忆》。今天我主要介绍一下我父亲18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故事很简单,讲的是学园里来了一条狗,野狗吧,好多同学追着狗又玩又打,最后把狗血淋淋地打死在厕所,后来一些工友居然把狗煮吃了。我父亲针对这事发了一通议论:为什么对一个有生命的动物要如此残忍!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他年轻的心灵中,已经把生命看得那么重,不光人的生命,一切生命,包括动物的生命,都是同样宝贵。这反映出他的善良和仁慈,以及对万物的爱,他那颗赤子之心早就在心灵中发芽了!所以,在纪念展览开幕的第二天,我把这篇文章放在了展柜里。

另外,我父亲那时候对文艺有些喜爱,除了写作之外,他还演过话剧。那是发现于徐汇中学的学生档案。当年他在徐汇公学念书时曾经参加过话剧《言出如山》的演出,他演的是一个小头目;资料里有剧情介绍、演员表,还有剧照,由于都化了装,难以辨认哪个小头目是我父亲;人物表上有我父亲的名字——傅怒安——这是父亲学生时代用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抗战胜利。40年代父亲给黄宾虹的信,都是署名“傅怒安”。这就是现在所能找到的父亲在文艺上一点启蒙的东西。

我父亲1927年年底去了法国,正式开始了他青年时代的第二个时期。为什么他会去法国留学呢?父亲有一个表哥叫顾仑布,属于20世纪20年代初勤工俭



学留法的那一批学生,他学的是纺织,那时候已回国,是一个工程师。他看到我父亲那个样子,就劝他去法国留学,他谈的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情况对我父亲很有吸引力,我父亲脑子非常灵活,善于吸收新鲜事物。可要做通我祖母的工作,非常不容易。这么一个传统的妇女,又是寡母孤儿这么过来的,怎么舍得让儿子不远万里到法国去留学!促成此事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我父亲的姑母傅仪,她毕业于当时的一所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中,我们从小非常敬畏她。她英文极好,看英文小说像看中文小说一样,人也非常开明。她从中斡旋,说服了我祖母。但她有一个条件,出国前必须跟我母亲订婚。我母亲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妹,大概上三四代有姻亲关系。他们俩本来就很好,我父亲欣然同意。这样,我父亲才顺利地留学法国。

他坐船去法国,1928年2月2日抵达马赛港。有人可能在《傅雷文集》里看到,他在旅途中写的15篇《法行通信》,这无疑可列入当代优秀散文。那时已经可看出他那典雅晓畅的文笔,以及独特精到的见解。到了法国后,他用半年时间专门学习语言。他在法国西部的一个小镇租了一个老太太的房子,老太太教他口语,另外请人教语法,就这样半年法语就过了关,能够在法国文艺沙龙里侃侃而谈,应对自如。在法国,他结识了很多艺术界的朋友,如刘海粟、张弦、刘抗、王济远、庞薰莱等,他们后来都成了大画家。这批人对他影响很大,在他们的引领下,他专攻美术史,研究美术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父亲当年在法国的同窗好友,后来在新加坡成为知名画家的刘抗,多次回国,见到我这个故人之子,感慨万千。他说:“我跟你父亲当年在法国真是情同兄弟,抗战时离别,直到20世纪60年代你哥哥傅聪去新加坡演出,才又跟你爸爸恢复联系,互有通信。有一封长信他写了六个小时,真是一篇精彩的美学论文。”刘抗跟我讲:“你爸爸那时在法国罗浮宫一张画前可以看半天,甚至一天,所以他后来才能写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么精彩的书。”我父亲到法国后,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他看罗曼·罗兰的第一本书就是《贝多芬传》,这使他喜爱上了古典音乐;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使他这个当年处于彷徨徘徊的热血青年找到了一盏指路明灯,他要为振兴中华,挽救苦难的中华民族而奋斗!1934年,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谈到了初读《贝多芬传》的感受,他写道:“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的振作。”他在法国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学习,一方面到罗浮美术史学校听课,钻研美术史和美术理论。

1931年秋天回国,一直到1936年底抗战前,是他青年时代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他主要在上海美专教课,后又去洛阳考察古物保管问题。我父亲回国后,受上海美专的创办人刘海粟的邀请,出任办公室主任,同时教美术史和法语。《罗丹艺术论》就是这段时间作为教材翻译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也是那个时候写的美术史教材。据后来他的学生(现在已过世了)见到我的时候说,我父亲当时



讲课非常生动,他用法国带回来的很多明信片、美术画册配合讲解。那时候他才24岁。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写过那些教材。《罗丹艺术论》是刘海粟的一个弟子在刘海粟家一大堆旧东西里翻出来的油印讲义,刘海粟的弟子就把这个油印讲义用正楷抄下来给了我,于是才有现在出版的《罗丹艺术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是我父亲亲自订上的一本手稿,浙江古籍出版社根据这部手稿出了复制本。在那本手稿发黄的封面上父亲用秀丽的正楷写下了“二十三年六月”,也就是1934年6月,那个时候他才26岁。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高,他没有把自己这部稿子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只认为是他青年时期的一部不成熟的作品;尽管那时不教书了,他还是认真修改整理成册。这可以看出他做事的认真,做事从来都是有头有尾,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都有一个交代。他对人对己一贯要求很高,所以这部稿子一直束之高阁,在我们兄弟俩面前,从来没有提起过。这部稿子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抄家退回的一堆书稿中发现的。我把书稿交给父亲的挚友美术家庞薰琹先生,由他来决定这部书稿是否有出版的价值。最后,在他的认可下,这部书出版了,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分析了我父亲撰写这本美术论著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他写道:“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不单是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作品,同时接触到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等。”7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至今深受读者欢迎,这就是我父亲文艺修养的魅力所在。他在美专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但他的性格是里方外也方,为人太直白,这样的人很难在社会上跟人合作。这儿举一个例子:他到美专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有一天上午大厅里挂了好多画,是一个年轻教授画的。他一看就让统统摘下来,认为这些画还不如学生的画。那个画家也在场,刘海粟后来到办公室做我父亲的工作,做不通。我父亲说他对事不对人,不行就是不行,不能滥竽充数。他当时刚回国,颇有抱负,很想在上海美专搞一番改革,结果他自己给改革掉了!

1936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的留法同学、青年画家张弦,是个很有才华的画家,我父亲非常赏识他。他的素描功底深厚,线条灵活而美。这年暑期张弦突然病故。我父亲非常悲痛,认为刘海粟办学太商人气,对张弦这样有才华的青年画家太苛刻,照顾不够,张弦的死刘海粟是有责任的。在张弦遗作展览会的筹备会上,我父亲和刘海粟闹翻,彻底决裂,一决裂就是20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政协会上碰面,他们才又恢复来往。这事美术界都知道,这也反映出我父亲的性格,他为人的“真”。

这段时期他还翻译了不少书,首先是1931年春初译的《贝多芬传》。1942年他重译这本书时,写了篇序言,谈到了“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到的教训”,以及这本书给他的“启示”,他这样写道:“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下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

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由此可看出他翻译《贝多芬传》的目的。

此外,他还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以及《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等书,共50多万字。从这些书可看出他进行翻译的目的很明确。他热爱这项事业,因为热爱才会去选择有教育意义的书来翻译,这些书都与青年修养有关。《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到现在还很受读者欢迎。这三部书记载了三个天才在人生的苦难中,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而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们能坚持艰苦的历程,全靠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贝多芬用痛苦换来欢乐;米开朗琪罗留下的不朽作品是他一生血泪的凝聚;托尔斯泰的小说写了人间无数生灵的渺小与伟大,描述了他们的苦难和苦难中获得的和谐。总之,我父亲翻译这些作品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广大青年,为了挽救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是他青年时代的第三个时期。

1937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是父亲的壮年时代。这一时段他处在敌伪的沦陷区,主要闭门翻译书,他翻译了《贝多芬传》、《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小说。他拿这些东西来鼓舞人的士气,跟日本斗争,好多人在看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前不久去世的王元化先生曾经讲过,他自己走上革命道路,就是因为看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可见对他影响之大。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的命运也很悲惨,讲到50年代时我再跟大家讲。

在这个时期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943年秋,他在上海给黄宾虹办了“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当时黄宾虹在北平,为了八十寿辰,日本人想给他办画展,他拒绝了!黄宾虹也是个非常有骨气有民族气节的画家。我父亲在他表妹顾默飞家看到黄宾虹的画,激动不已,赞不绝口,于是提笔给黄宾虹写信。黄宾虹收到我父亲的信,也同样激动不已,尽管他们年龄相差45岁,黄宾虹却认为傅雷确是他“平生一大知己”,自此这对忘年交书信不断。顾默飞是前面提到的我父亲的表哥顾仑布的妹妹,是黄宾虹的女弟子。这次巡展也展出了几封他们来往的书信,这也展现了他们的书法艺术。从1943年春开始,我父亲为筹办黄宾虹的书画展,到处奔走。那个时候我还小,才6岁,印象里就是父亲进进出出,忙得很。家里尽来老人,因为黄宾虹这一辈的人那时都已七八十岁;整天听他们讲黄宾虹长黄宾虹短的。后来我记得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举办了展览,那时黄宾虹不时把画寄来,我父亲亲自登记做账,展会上卖了画,还得设法把钱汇到北平,这些来往的信件,包括他给黄宾虹报的账目,都收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傅雷书信集》中,计有119封信。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忠诚地对待朋友,怎样真心地对待一个有德有才的艺术家。所以,有人讲,没有傅雷在那个时候为黄宾虹呐喊,黄宾虹不一定有现在这么一个地位!还有人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傅雷那



种可贵的策划才能。

我父亲不仅给黄宾虹办书画展,还给他出画册,出展览会刊,亲自写了高度评价黄宾虹绘画的文章——《观画答客问》,那是至今公认的第一篇评论黄宾虹绘画的很重要的文献。

1944年春,他还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到现在为止,这是一篇公认的评论张爱玲小说最早、最重要的文献。他肯定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否定了其他几个短篇。当时的张爱玲并不以为然。柯灵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后见到我,深情地对我讲起当年在他主编的《万象》发表我父亲的那篇文章的事:“你爸爸就那么直白,他有一颗爱才之心,他觉得张爱玲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正是爱护这样的青年作家,才黑白分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的问题症结。”大家可以在《傅雷文集》里找到这篇文章。他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结论”里写道:“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他就是这样真诚地对待一个真有才气的青年作家。在文章的最后,他用诗一样的语言道出了写这篇评论的真实目的:“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我父亲壮年的第二个时期,是从1945年9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个时期,他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反对腐败的蒋介石政府。他跟马叙伦、陈叔通、许广平等老一辈的民主人士,联合发表了“反蒋”宣言;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其实,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真正创办人之一是傅雷,当年筹备民主促进会成立的时候,一共也不到30人,选理事的时候从3人、5人、7人、9人,一直增加到21人,我父亲就不干了!觉得怎么有那么多人想当官呢!在正式选举前,他就活动,劝许多老朋友不要选他当理事,所以最后他只是一个候补理事。1949年后,他就根本不参加活动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可以积极发展会员,1956年8月马叙伦还健在,还有搞统战的徐伯昕,都写信来力促他回“民进”,进中央委员会,我父亲急得打电报,还同时写信去婉拒。他在给徐伯昕的信中写道:“我的长处短处,兄十年交往,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样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又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殊途同归,无分彼此,一个人的积极性只要能尽量发挥,党与非党、民主党派与非民主党派都没有大关系。”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他那颗无比真诚的赤子之心!这一段时间他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写下了大量一针见



血、观点犀利的有关时局、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政论文,关注的领域很广泛,从广岛原子弹到对汉奸的审判,再到学生的请愿。总之,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敢于直言,敢讲真话。这些文章发表在与周煦良合办的《新语》半月刊以及《民主》、《周报》、《观察》、《文汇报》等刊物上。如当年他抨击国民党政府而写的《废止出版检查制度》,文章尖锐地指出:“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这段文字显示了我父亲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颇有远见的文人。至今读来,还是很富有现实意义!

1946年深秋,他热情洋溢地为留法画家庞薰琬办了一个画展,地点选在上海震旦大学大礼堂。1924年冬,庞薰琬在上海震旦大学学医,那时正逢寒假,他正在犹豫:究竟继续学医呢,还是干脆改行学绘画!在校门口碰到了比国神父泰叶,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谁知平时看来很和蔼的神父,却突然脸色由白变红,由红变紫,大声吼道:“老实告诉你,你们中国人,成不了大艺术家!”在这种情景下,本来犹犹豫豫的庞薰琬毅然下了决心:放弃学医,改行学绘画。他很有礼貌地对泰叶神父说:“先生,你等着瞧吧!”我父亲知道庞薰琬弃医学画的故事,所以抗战胜利后,庞薰琬从内地回到上海,父亲看了他在湘黔川滇,深入苗彝地区采集画材的大量绘画作品,就自告奋勇地在上海震旦大学大礼堂举办了庞薰琬绘画展览会。还专门写了篇序,称其“融合东西艺术之成功,决非杂糅中西画技之皮表,以近代透视法欺人耳目者可比”,且盛赞他的白描古代舞像“用笔凝练,意态生动,不徒当世无两,抑可追逼晋唐”。总之,给庞薰琬办画展,就是让瞧不起中国人的比国神父看看,我们“中国人,成不了大艺术家”吗?

在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说使我父亲受累一辈子。1947年他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三篇文章,合集出了一本名为《美苏关系检讨》的书,还专门写了一篇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我父亲在代序中指出:“美苏关系的是非,斯诺的文章分析得很详尽,暂可不提。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摘。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红军在东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厂,进步刊物噤若寒蝉,不置一词。”我父亲主张建立“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想”。他不能赞同“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美,必近乎反动,甚至就是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跳出这样的二元思维模式,“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就反对”。文章发表后,遭到左翼人士周建人等的围攻,说他的观点和“法西斯蒂”不远了,并扣上了“亲帝反苏”的帽子。于是他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撰文《所谓反帝亲苏》,予以反驳。他在文章中质问:“实质上与《中俄条约》并无二致的《中苏条约》,红军搬走东



三省的工厂,全是我深文周纳,或向壁虚造,或轻信流言吗?从而我的抗议也变成了‘反苏’,变成了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证据?”他接着指出:“‘左派’论客认为红军在东三省作战两星期,牺牲红军若干万,理应获得赔偿;仿佛东三省的人民大众在日本铁蹄下做十四年奴隶倒是活该!……凡是有自由良心,没有政治偏见,希望民族挣扎图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国的自由独立是一个大讽刺。”他认为:“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去看。”斯诺的文章是根据客观事实写的,百分之九十是批评美国,只有百分之十是批评苏联的。当时那些“左派”论客,对苏联是一点都不能批评,谁批评谁就是“反苏亲美”,甚至对文章中批评苏联全部掠走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所建的工厂的事实,说是“不见得是真的”。现在历史已经证明真理不在那些“左派”手里,尤其在苏联解体后,那时的档案都已解密。我父亲当时一是没有偏见,有的是满腔热情的爱国正义感,二是他从国外的外文资料中获得了大量真实信息: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30年代惨无人道地杀戮了一大批革命有功之士;当年苏联如何全部掠走日本在我国东北建的工厂,霸占了旅顺、大连,迟迟不归还我们,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当时那些所谓的“左派”,究竟是无知呢,还是有意颠倒黑白一边倒呢,我看两者皆有吧!父亲针对周建人等“左派”的论调,有几段极其精彩的驳斥,至今读来颇令人深思。他这样写道:“武断往往并非恶意,而由于天真。惟其天真,才会有宗教热情,才会盲目,才会褊狭。不把人类先定了原始罪恶而后宽恕,怎显得上帝的慈悲与宗教的伟大?不来一次十字军与异教裁判所,怎显得神的威严与真理的神圣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自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创一个新宗教。其迷人处与可怕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论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诅咒亦未必真入地狱。”大家细细琢磨琢磨,这些话是不是很富有现实意义!

文章的最后,他还写道:“话又得说回来,内战决不会永久打下去,现状迟早要改变。比破坏更重要更艰苦的事业还在后面,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做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闯大祸的时候。”试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灾难,不就给他言中了吗?这不能不说我父亲是富有预见性的。

到了1957年反右时期,我父亲的这笔账又给翻了出来,给他扣上了“走中间路线”、“反苏”的帽子。当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有“反苏”这条罪状,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那些所谓的“右派”,才是真正善于独立思考,具有真正独立人格的爱国者,真理在他们手中。

1948年11月,受挚友宋奇委托筹办进出口公司,我父亲携全家奔赴昆明。父

